

## 第肆章 女性眼中的「新女性」

十九世紀後半，女性議題在俄國社會引起眾多討論。十月革命前，更有許多俄國女性已積極投入女性運動之列。然而，一九二〇年內戰結束之後，女性才算真正擁有社會影響力。

### 第一節 一九〇五～一九二〇年的女性運動

十九世紀五〇年代，女性議題始引起俄國各派知識份子注意，無論是五〇年代的西歐主義、六〇年代的虛無主義、七〇年代的民粹主義，還是八〇年代的馬克思社會主義皆認為性別歧視現象為俄國社會落後之象徵。多虧十九世紀男性知識份子的支持與推動，「新女性」成為俄國社會的新興階級。女性本身自我意識發展為女性運動最重要的關鍵。經過幾十年的醞釀，女性意識終於萌芽。「新女性」走出家庭，獨立工作，極力擺脫男權社會之控制。女性教育與就業率也都逐漸獲得改善。然而，真正的女性運動實際上於一九〇五年的「流血星期天」事件(Кровавое воскресенье)之後才正式展開。

本論文第參章曾提到美國學者李查·史戴特斯(Richard Stites)將六〇年代的「新女性」分為女性主義者、虛無主義者與激進份子三個流派。然而，虛無主義女性至七〇年代已不復存在，激進份子大多成為馬克思社會主義者。二十世紀初「新女性」僅分為女性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兩派。兩派的「新女性」不論政治立場、成員與訴求皆大不相同。女性主義者熱衷於「女性投票權運動」，馬克思主義女性則發起「無產階級女性運動」，兩派女性為了爭取中下階級女性支持，不斷產生衝突、對立，甚至互相批評。

#### 壹、第二代女性主義者

六、七〇年代的第一代女性主義者以慈善事業為重心，她們不干涉政治，僅

成立基金會或社團，協助婦女受教育或經濟援助貧困女工。她們在女性教育與就業方面之努力功不可沒。然而，第二代女性主義者開始將注意力轉向政治領域。多虧幾十年來籌組基金會的經驗累積，第二代女性主義者的組織能力與自信心皆大幅提昇，地區性的慈善事業再也無法滿足她們。一九〇四年芬蘭國會通過女性投票權法案更爲俄國女性主義者打了一劑強心針，她們深信俄國婦女也能擁有投票權。順者一九〇五年勞工運動與政黨活動的氣勢，女性主義者展開一系列女性選舉權運動。其中最著名的有柳波芙·古列維奇(Любовь Яковлевна Гуревич, 1866-1940)、安娜·莎巴洛娃(Ан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Шабанова, 1850-1932)與瑪麗亞·帕克羅夫斯卡婭(Мария Ивановна Покровская, 1852-1922)。

除了女性主義者外，政黨同樣關注女性議題。十九世紀九〇年代，俄國國內陸陸續續成立許多政治組織，各黨派的成員與目標皆不同。其中關心女性投票權的政黨有社會民主工黨(Российская 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абочая партия)、社會革命黨(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與立憲民主黨(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這些政黨爲了展現多元化特色，力邀女性入黨。女性主義者認爲透過政黨幫助，女性必能盡快取得應有權利。唯有瑪麗亞·帕克羅夫斯卡婭拒絕男性幫助，她認爲男性未來的政治藍圖絕對不包括女性，和男性一起奮鬥的女性將會失去原本奮鬥意義與目標。事實誠如她所假設，男性將所有注意力都放在政治、經濟與土地等議題上。他們關心女性議題僅是爲了獲得改革派人士支持而刻意塑造出來的形象。男性黨員聲稱他們並非刻意忽略女性權利，只是忘了向國家杜馬提出女性投票權法案。<sup>81</sup>一九一二年，女性投票權終於列入第四屆國家杜馬議案，結果卻是 206 票對 106 票駁回。女性主義者的女性投票權運動未能獲得令人滿意之成果便劃下句點。

女性主義者未能獲得具體成果與支持，其中最大的原因爲女性主義者大多屬中上階級，她們只能爲中下階層的女性奮鬥，不能與她們一起奮鬥。成長背景之差距使她們無法體會農村婦女與工廠女工的確切需求。女性主義者只能以中上階級女性的利益爲出發點。她們期盼其他階層的女性能站出來提出自己的訴求與目標，無法爲大多數女性喉舌卻成爲女性主義者失敗的最主要原因。

---

<sup>81</sup> Stites, Richard.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Russia: Feminism, Nihilism, and Bolshevism 1860-1930*. New Jersey: Princeton UP. 1978, p. 208.

## 貳、 社會主義女性

社會主義女性乃是以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的共產主義為理想的俄國「新女性」。和女性主義者不同，社會主義女性主張改革無法實現真正的男女平等，她們深信唯有推翻封建制度並建立共產社會，兩性才能完全平等，女性才能完全解放。

列寧(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 1870–1924)之妻克魯普斯卡婭(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ская, 1869-1939)為俄國第一位以社會主義角度討論女性議題的人物。她於一九〇〇年發表在《火星》雜誌(искра)〈女工〉一文(Женщина-работница)詳細描述農村婦女與工廠女工的生活困境：由於過渡工作，營養不良的農村女性無法讓小孩受完整教育，農民階級只能生活於黑暗之中；工廠女工薪資低廉，被迫賣淫，無力扶養小孩，只能棄養。<sup>82</sup>中下階層女性的悲慘遭遇引起廣泛同情與討論，社會主義女性趁此趨勢展開無產階級女性運動，柯隆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оллонтай, 1872—1952)與阿爾曼德(Инесса Фёдоровна Арманд, 1874-1920)為社會主義女性最具代表性之人物。

柯隆泰為俄國女性運動史上最重要之女性。二十世紀初期，女性主義者因擁有報章媒體與知識份子等製造輿論的力量，影響力大過社會主義女性。為了讓馬克思主義滲入中下階層，柯隆泰親身接觸女僕與女工，頻頻至紡織廠發表演說。此舉對女性運動有極大貢獻，因為中下階級的女性大多不識字，對期刊上吵得沸沸揚揚的女性議題毫無所知。柯隆泰藉著出色的演說能力，引起廣大迴響。除了以演講吸引支持者外，柯隆泰還出席女性主義者召開的會議，公開與女性主義者辯論，抨擊其資產階級想法的狹隘與自私。一九〇八年，柯隆泰為躲避政府追捕，逃離俄國。意外獲得機會參與一九一〇年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 1857-1933)<sup>83</sup>主持的第二屆國際社會主義婦女代表大會，俄國的無產階級女性運動因此揚名國際。一九二〇年，由於柯隆泰參加俄國共產黨內的工人反

---

<sup>82</sup> Stites, op. cit., p. 241.

<sup>83</sup> 克拉拉·蔡特金為國際工人運動傑出的女活動家，德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她不僅為工人階級事業鞠躬盡瘁，奉獻一切，同時也對國際婦女運動作出卓越貢獻。一九一〇年蔡特金召開第二次國際婦女代表大會並建議將三月八號訂為國際婦女節，受到各國熱烈支持，她也因此被譽為國際婦女運動之母。

對派，為最早反對蘇維埃政府官僚主義傾向的革命家之一，加上她於審判會議上公開袒護丈夫等行為引起政府官僚反感，這位俄國史上最著名的「新女性」因此被迫出國擔任外交官工作，從此遠離權力中心。

阿爾曼德繼柯隆泰之後，接下俄國國內的社會主義女性運動。阿爾曼德早期原是女性主義者，但當她目睹城市暴力景象，深刻體會僕人與農民生命之脆弱後，阿爾曼德漸漸變成社會主義者。一九一二年，阿爾曼德在列寧的支持下，於黨報「真理報」(Правда)中發表一系列剝削女工的文章，成功帶起社會主義女性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文章的風氣。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後，俄國社會因內戰而動盪不安。過去女性戰時頂多從事醫療或調度糧食等工作，但內戰時許多女性共產黨員卻一肩扛下宣傳、作戰、間諜等政治工作。由於這些女性的犧牲奉獻，蘇聯政府無法忽視女性功勞。一九二〇年內戰結束後，所有參與內戰之女性皆獲得官職，一九二一年蘇聯婦女局(женотдел)正式成立，阿爾曼德為第一位負責人。阿爾曼德逝世後，依序由柯隆泰、斯米朵維琪(Софья Николаевна Смидович, 1872-1934)、依蘭斯卡婭

(Клавд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 Еланская, 1898-1972)與阿爾秋希娜(Александра Васильевна Артюхина, 1889-1969)接管婦女局。<sup>84</sup>

圖 4-1 1923 年



婦女局為唯一關心女性問題的政府機構，對女性運動貢獻良多。婦女局以改善中下階層女性的生活情況為目的，從教育、經濟、家庭等層面提升女性地位。消除農工階級女性的文盲現象為婦女局面臨的第一個任務。中上階級女性從十九世紀後半便可接受中等教育，甚至高等教育；大部分的農婦與工女卻是文盲。為了掃

<sup>84</sup> Stites, op. cit., p. 332-334.

盲，婦女局深入各城市教育中下階層婦女，教她們識字、閱讀，更灌輸她們簡單的經濟與政治概念。圖 4-1 便是當時鼓勵女性學識字的宣傳海報。在婦女局的努力下，女性識字率從一九二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五提高到一九二六年的百分之四十二。除此之外，婦女局監督工廠女工的就業情形，要求提高薪資、減少工作時數、嚴禁性剝削與其他不當待遇，更企圖降低女性失業率。婦女局還立法禁止農民毆妻，設法提升農婦教育水準。農婦的轉變過程在農民作家涅維羅夫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Неверов, 1886 - 1923) 的短篇小說〈女布爾什維克瑪麗亞〉 (Марья-большевичка, 1921) 可略窺一二。小說女主角瑪麗亞原本是個連丈夫大發脾氣時都能微笑地服侍他的傳統俄國女性，但當布爾什維克黨進入農村宣傳後，瑪麗亞便逐漸轉變。

以前她 (瑪麗亞) 不太顯露自己的個性，對於家裡頭那些不順心的事多半藏在心裡。可是等到布爾什維克們帶來了自由，向娘兒們胡亂宣傳，說妳們如今與男人平等了，這下子連瑪麗亞也睜開了眼睛。只要有人到村子裡來演講，她馬上跑去聽，似乎完全忘了羞恥。<sup>85</sup>

之後，瑪麗亞開始學習識字看書，再也不願安分地當個傳統女人。

她 (瑪麗亞) 開始插手管起男人家的事情。只要我們這兒一開會，總有她的份。男人們惱火起來。

「瑪麗亞，燒你的菜湯去！」

她哪裡肯聽！只翻翻眼睛。居然想出個什麼婦女部來。這種詞兒我們從來也沒聽過，大概不是俄文吧！大夥兒一看，娘兒們一個接著一個地不安分起來，真是見鬼！<sup>86</sup>

之後，瑪麗亞和丈夫離婚，甚至被選為地方蘇維埃代表。除文學作品中有描述

---

<sup>85</sup> Неве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Марья-большевичка*  
[http://az.lib.ru/n/newerow\\_a\\_s/text\\_0020.shtml](http://az.lib.ru/n/newerow_a_s/text_0020.shtml)

<sup>86</sup> Также.

中下階層婦女轉變之外，婦女局還出版了《農婦》(Крестьянка, с 1922 г.)與《女工》(Работница, с 1914 г.)兩種期刊，裡面大多刊登女工學習讀書、寫字與新技能並找到好工作的奮鬥故事，塑造中下階層女性的理想典範。藉此喚起女性意識，宣揚「新女性」的形象與理念。

除了兩派「新女性」外，俄國社會還存在一些不屬任何派別的「新女性」。她們大多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女作家，透過創作追求自我認同，連帶提升讀者的女性意識。十九世紀末，受教育女性人數增加，女性閱讀人口也隨之提升。出版社因此大量刊登女性作家作品及其畫像，其中以女作家的自傳式作品最受歡迎。女作家成為一股衝擊傳統文學的新潮流，無奈卻引起許多男作家不滿。他們批評女性作家沒有寫作天分與才能，作品更缺乏創新思想。作家亞布拉莫維奇(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Абрамович, 1881-1922)在《女人與陽性文化世界》(Женщина и мир муж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13)中寫道「女性實際上缺少創造力，它不似人類靈魂般地存在，不似原始、天生的自我認同，女性參與思維生活世界根本毫無意義。」<sup>87</sup>托爾斯泰則否認女性在文學領域具有創造偉大作品的的能力，他認為從事文學創作事業，必須犧牲一切，包括家庭，所以「婦女永遠是中等才能的作家。」<sup>88</sup>然而，女性自傳作品仍被視為文學界之進步。帕納馬烈夫(С.И. Пономарев)在《我們的女作家》(Наши писательницы, 1891)中表示女作家使社會變得更真誠、更文明，而且人性化。<sup>89</sup>女作家不僅能詳細描述女性內在心靈活動與思維模式，她們成為當代女性爭相模仿的對象。在這些女作家身上多具備男性及女性特質。

當時最受女性讀者歡迎的作家有莎皮爾(Ольга Андреевна Шапир, 1850-1916)、薇爾畢茨卡婭(Анастас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 Вербицкая, 1861-1928)、吉比尤絲(Зинаид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Гиппиус, 1869-1945)以及茨薇塔耶娃(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Цветаева, 1892-1941)等人。這時期女作家的作品多以描寫女性內心

---

<sup>87</sup> Marsh, Rosalind. Criticism and jour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on the work of Russian women writers// Women and Russian Cultur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1998,p100 此文為 Marsh翻譯 Казакова Ирина發表在*Русский феминистский журнал*. 1995.№3, с. 63-67 之〈Критика и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к.ХІХ - н. ХХ веков о творчестве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ьниц〉一文。

<sup>88</sup> 孫美玲。〈俄羅斯女性文學翼影錄〉//《俄羅斯文藝》。1995，№2，頁 47。

<sup>89</sup> Marsh, op.cit., p. 99.

的掙扎為主題。一種為描述「新女性」在忠於自己，抑或屈服現實的兩難情況中掙扎，薇爾畢茨卡婭作品中的女性多為此類。另一種則關注在女性內在傳統特質與反傳統渴望，兩者間的矛盾造成「新女性」內心掙扎，其中以茨維塔耶娃最具代表性。

薇爾畢茨卡婭為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最活躍的女性作家之一，其多部作品皆為當時暢銷之作。《她獲得解放》(Освободилась, 1898)、《新形式》(По-новому, 1902)與《幸福之鑰》(Ключи счастья, 1908-1913)等多部作品都以「新女性」為主角。《她獲得解放》中的女主角麗莎·梅麗古諾娃(Лиза Мельгунова)因無法決定該屈服經濟困境，留在丈夫身邊，抑或順應自己的感情，與情人克里緬科(Клименко)相守，最後透過自殺解放自己。當時許多女性徘徊於愛情與家庭之間，儘管她們內心承受極大的矛盾與衝突，仍不願受社會限制而走向滅亡之路。《新形式》的女主角瑪麗亞(Мария Васильевна)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女老師，當她愛上同事索伯列夫(Михаил Соболев)並決定結婚時，她定下新的婚姻形式：包括擁有各自的房間、獨立的生活，不相互干涉等種種規定。瑪麗亞的理念與車爾尼雪夫斯基《怎麼辦？》中的薇拉十分相似。然而，婚後情形卻無法像《怎麼辦？》描述般地完美。除了索伯列夫無法忍受妻子的規定而外遇，瑪麗亞懷孕被迫離職也是當時「新女性」最常遭受的困境之一。失去經濟能力的瑪麗亞只能屈服於丈夫，最後仍回歸傳統婚姻形式。《幸福之鑰》是薇爾畢茨卡婭最有名的作品。女主角瑪妮雅(Маня Ельцова)為一名同時追求理想與工作權利的芭蕾女伶，儘管她同時愛上兩個男人，卻不願與任一人分離，堅持與兩人維持性關係。瑪妮雅乃是追求性解放的「新女性」原型。薇爾畢茨卡婭早期作品的女主角多為追求自我獨立，卻因性別與社會環境而受阻礙的作家、老師或醫學院學生。這些「新女性」在愛情與家庭，或家庭與工作的矛盾中，仍以家庭為主軸。男性批評家尚能接受此類作品。然而，當薇爾畢茨卡婭晚期以追求美麗、藝術或性滿足等方式實現自我的「新女性」為主角時，她便受到男性批評家的強烈批評與污蔑，其作品的價值因此降低。<sup>90</sup>

茨維塔耶娃為俄國史上最出色的女詩人之一，她多部詩作皆表達出「新女

---

<sup>90</sup> Marsh, Rosalind. Anastasiia Verbitskaia reconsidered.// Gender and Russian Literature: New perspectives. New York: Cambridge UP, 1996, p. 189.

性」忠於自己、熱愛自身靈魂的理念。譬如，一九一三年〈我的血管注滿陽光〉(Солнцем жилки налиты, 1913)一詩便表達其對自身靈魂之狂熱。「我的血管注滿陽光—並非鮮血—在深褐色的手臂中。我獨自一人，懷著巨大的愛情，熱愛自己的靈魂。」一九一五年的詩作〈吉普賽人衷於離別〉(Цыганская страсть разлуки, 1915)透露出無人能瞭解女性內心世界，以及「新女性」看似離經叛道，違背社會風俗，實際上乃是忠於自己的無奈。「即使翻遍我們的書信，也無人明白心中真情，我們如此背信棄義，意味著—我們多麼忠於自己。」<sup>91</sup>除了詩作之外，她的自傳性作品《我的普希金》(Мой Пушкин, 1937)從女性觀點重新解讀普希金紀念像與普希金。普希金紀念像對幼兒時期的茨維塔耶娃而言，並非僅是偉大詩人的銅像，她的認知系統也是建構在這尊普希金紀念像上。

普希金紀念像讓我接觸人生中第一次的數目課，第一次的比例課，第一次的材料課，第一次的等級課，以及第一次的思考課。最重要的是，它教會我下面的這個生活經驗：就是一千個瓷娃娃，即便一個個疊起來，也成不了一個普希金。<sup>92</sup>

我由於普希金紀念像而對黑色產生瘋狂的愛，貫穿我整個生命，直到今天，每當我在有軌電車上或別的地方，偶然與黑色相遇，我便感到它有一種誘惑力。我對白色的冷漠和對黑色的崇尚緊密相連。我從每一個黑人身上去愛普希金和瞭解普希金—那座我啟蒙前的幼年時代的以及全俄羅斯的黑色普希金紀念像。<sup>93</sup>

由此可知，普希金紀念像對她的世界觀產生極大影響。然而，這尊普希金紀念像並非象徵傳統俄國文學的優美，而是平等與奮鬥的紀念像。它賦予幼兒時期的茨維塔耶娃平等的概念，包括種族平等與性別平等。

普希金紀念像超越了事件—是一座反對種族主義、擁護所有人種平等，擁護每一個人種平等的紀念像—只要這個人種能夠貢獻出天才。〈...〉

<sup>91</sup> 兩詩皆出於此網站。Марина Цветаева.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1909-1941.

<http://crea.ru/cvetaeva/index.html>

<sup>92</sup> 瑪·茨維塔耶娃。《老皮緬處的宅子》。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頁 107。

<sup>93</sup> 同上註，頁 108。



是為自由、為受奴役、為元素、為命運、為天才最終取得勝利而豎立的紀念像：是為掙脫鎖鍊站立起來的普希金豎立的紀念像。<sup>94</sup>

從上述作品皆顯示出茨維塔耶娃的「新女性」特質，她重視平等、忠於女性內在思維，熱愛女性獨特的靈魂。然而，她卻仍保留許多傳統女性特質。俄國學者克列西寇娃(И. Кресикова)發表的〈瑪琳娜·茨維塔耶娃的女性本質〉(Женская суть Марины Цветаевой)一文便是探討茨維塔耶娃作品中熱情、敏銳、脆弱的傳統女性特質。<sup>95</sup> 這種傳統特質與「新女性」思維模式所造成的衝突，讓茨維塔耶娃產生分裂的人格。茨維塔耶娃一九二六年寫給利力克(Райнер Мария Рильке, 1875-1926)的信中寫道「有很多個我，你懂嗎？也許，數不清地多！(無止盡的數目！)而且每個我都不需知道其他我的存在。」<sup>96</sup> 一九三七年，茨維塔耶娃寫給伊凡斯克(Юрий Павлович Иваск, 1907-0986)的信中重複同樣想法：「我心裡存在很多位作家，至於他們如何在我心中交纏—這已經是我的秘密了！」<sup>97</sup> 茨維塔耶娃自認內心存在無數個自我，這種分裂性便是女性掙扎於傳統特質與「新女性」叛逆思維中造成的結果。

不論是哪一派「新女性」，她們都已發展出自我意識與思維模式，不再是隨波逐流、任憑外界處置的傳統女性。為了徹底擺脫男權社會思想之箝制，女性重新定義「新女性」特質，不願透過男性觀點決定女性形象與個性。

## 第二節 女性眼中的「新女性」特質

從本論文第參章分析可得知，十九世紀男性知識份子將設法透過經濟獨立擺脫男性控制，抑或藉由高等教育提升社會地位，以及不顧世俗眼光勇敢表達感情，追求自由的愛(Свободная любовь)的女性，皆稱為「新女性」。換言之，十九世紀男性從經濟、教育與感情層面定義「新女性」特質。革命後，「新女性」一詞從男權社會下的犧牲者變成共產社會的理想女性，「新女性」象徵新社會的

---

<sup>94</sup> 同註 91，頁 109-110。

<sup>95</sup> Кресикова. И. Женская суть Марины Цветаевой.//На Путиях к Постижению Марины Цветаевой. Москва: Дом-музей Марины Цветаевой. 2002, с. 331-345.

<sup>96</sup> Также, с. 333.

<sup>97</sup> Также.

來臨。此階段呈現出來的「新女性」特質與形象，和十九世紀男性作家筆下的女性迥然不同。

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府賦予所有共產社會成員平等的工作權與教育權，不論性別與社會階級。簡化結婚與離婚手續，墮胎合法化以及男女合校等承諾陸續實現。女性自然不再從經濟與教育層面定義「新女性」，因為經濟與教育上的兩性平等乃是理所當然之事。與男女關係最密切的婚姻、性愛與家庭成為女性關注的焦點，尤其以共青團成員(Комсомол)最熱衷於創造新興道德觀。本節將從婚姻、性愛與家庭觀三方面重新定義一九二〇年代社會主義女性眼中的「新女性」。

## 壹、 婚姻關係

資本主義中的家庭與婚姻一直為馬克思及恩格斯所詬病。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中將消滅家庭視為實現共產主義之首要條件。他認為婚姻「建築在資本上面，建築在私人發財的制度上面。這種家庭的發展型態只有在資產階級中才存在」。<sup>98</sup>由於資本社會婚姻建築在金錢關係上，無經濟力的女性只能成為男性奴役的對象。因此，婚姻與家庭之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自由與平等的兩性關係。<sup>99</sup>二十世紀初期社會主義女性承襲馬克思反對資本主義婚姻之概念，以廢除婚姻制度為最終目標。柯隆泰於一九一八年的演講中表示傳統男權家庭中，丈夫握有管教妻子及小孩之權力，共產社會應廢除這種歧視女性的制度。她認為婚姻應該由自由、獨立，且平等的共產社會成員所組成，此種形式的婚姻組合不僅互相尊重且擁有同伴般的情誼。<sup>100</sup>一九一八年頒佈的法典(Кодекс 1918 г.)卻仍保留婚姻制度，社會主義女性與共青團團員皆大失所望。男女黨員不需到教堂舉行婚禮，但必須到戶籍登記處登記結婚(Запись ак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簡稱ЗАГС)。<sup>101</sup>離婚程序簡化同樣為

---

<sup>98</sup> 馬克思著，孫善豪譯。〈共產黨宣言〉，《第一個非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作品選讀》。台北：誠品，1999，頁179。

<sup>99</sup> Shlapentokh, Vladimir. *Love, Marriage, and Friendship in the Soviet Union: Ideals and Practice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84, p. 19.

<sup>100</sup> Stites, Richard. op. cit. p. 351.

<sup>101</sup> Барисовна, Лебина Наталья. *Повседневная жизнь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рода: нормы и аномалии. 1920-1930 год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ева, 1996, с. 267.

此法典的重點之一。雙方同意之情形下，夫妻兩人簽字，即可當場離婚，如有異議也只需舉行簡單的公聽會即可。由於離婚簡化，二〇年代出現離婚熱潮，四年間離婚件數竟超過十二萬件。<sup>102</sup> 儘管蘇維埃政府簡化結婚與離婚程序，部分社會主義女性仍堅持廢除婚姻制度。她們認為只要存在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女性就會侷限於傳統家庭事務之中，永遠無法走出家庭，追求自我實現。

單身「新女性」為當時女性反對婚姻，輕視愛情之最佳代表。二十世紀初，俄國社會出現一群打扮沈穩俐落的單身「新女性」(холостая женщина)。白天她們待在在辦公室或工廠中，為工作與理想奮鬥，晚上則過著獨居生活。這些單身「新女性」能力佳，獨立且自由。對她們而言，性愛僅是生命的次要成分，共產社會的理念與使命才是她們生活的重心。這些女性有自我原則而不情緒化，她們瞭解自由與獨立的價值，不會盲目服從模糊不清之傳統「女性特質」；她們堅持自我特色，不受情人影響；她們能堅定享樂權力，不會虛偽地戴上美德面具；更重要的是，她們很樂意將愛情放在生命中的次要地位。<sup>103</sup> 婚姻並非單身「新女性」生命的最後歸路，她們不隨波逐流，不因外界環境改變自己的理念與想法。單身「新女性」重視女性原始個性勝過愛情，她們不願依靠男性奠定自己的社會地位，寧可維持單身，活出自己的生命價值。

除了少數將社會使命視為人生目標的單身「新女性」外，大部分共青團成員選擇不登記結婚作為反對婚姻的手段，這種婚姻形式稱為「實際婚姻」(фактический брак)。這些男女不願依法登記結婚，以同居形式維持夫妻關係。早在沙皇時期便有許多革命份子以同居作為反對傳統婚姻之手段，他們不願透過正式的婚姻程序表示夫妻關係。二十世紀二〇年代許多共青團成員選擇實際婚姻作為反抗政府政策的方法。這些年輕黨員認為實現共產社會理想之前提為推翻所有傳統制度，資本社會婚姻更是必須盡早廢除的制度之一。起初，實際婚姻僅為年輕黨員表達不滿情緒的形式。然而，既不需登記結婚，也不需辦理離婚的婚姻形式吸引不少追求自由男女關係的人。這種不論結合與分離皆不須經過政府或教堂單位同意的婚姻形式形成一股新熱潮。青年男女認為實際婚姻賦予男女雙方真正的自由，夫妻間不再擁有傳統法律責任與義務。兩性相處模

---

<sup>102</sup> Stites, Richard. op. cit. p. 370.

<sup>103</sup> Ibid. P. 350.

式開始發生變化，有些人甚至不再遵守一夫一妻制。婦女局主管維娜格拉斯卡婭 (Полина Семеновна Виноградская, 1897-1979) 曾公開表示「如果不危害蘇維埃政權之利益，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家庭皆有存在之權利。」<sup>104</sup> 然而，鬆散的家庭結構勢必造成社會問題，其中以私生子問題最為嚴重。「新女性」的家庭觀則是解決此問題之關鍵。

## 貳、 家庭觀

孤兒及私生子氾濫於十九世紀末已是相當嚴重的社會問題。遭男性玩弄的中下階級女性，無力扶養小孩，只能丟棄他們。儘管沙皇政府成立孤兒院等救助機構，棄嬰現象仍舊未獲改善。在街上遊蕩、長大的孤兒爲了生活不得不偷拐搶騙。孤兒犯罪也成爲一大社會問題。革命後，蘇維埃政府的當務之急便是妥善安頓孤兒與私生子，社會主義女性趁機提出公共育兒所之概念。

社會主義女性主張實現兩性平等之首要條件爲解除婦女肩上的家庭重擔，政府必須負起原屬於女性的家庭工作，包括養育小孩。<sup>105</sup> 柯隆泰質疑傳統文化一再強調母性之目的。她表示性愛的重要性遠勝於母愛，母性並非女性生命存在的重心。長久以來，母親身份使女性被迫困在家庭之中。爲了幫助女性走出家庭，蘇維埃政府應成立公共育兒所，要求國家擔起傳統母親之功能。柯隆泰表示政府「要將做母親的一切煩累，從婦女肩上除去，移向集團，因此子女教育工作，有由家庭範圍移向社會的必要。」關於「幼兒的養護、子女的物質保護，社會教育的正當設備等，必須由母親部、幼兒保護部和教育人民委員部的社會教育課來擔任。」<sup>106</sup>

柯隆泰認爲母愛不應該侷限在親子間，共產社會的女性應該深愛所有無產階級勞工之後代，不分彼此地照顧政府的小孩才是共產社會的理想。作家葛拉寇扣夫 (Федо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Гладков, 1883-1958) 小說《水泥》 (Цемент, 1925) 中的女主角達莎 (Даша) 便熱愛所有幼兒園的小孩，絲毫不偏愛自己的女兒。文中描

<sup>104</sup> Барисовна, Лебина Наталья. op. cit. c. 272.

<sup>105</sup> Shlapentokh, Vladimir. op. cit. p. 21.

<sup>106</sup> 柯崙泰，《新婦女論》。香港：新苗出版社，1994，頁 156。

述達莎與小孩們嬉戲的片段，比達莎與女兒單獨相處時更具母性光輝。

「達莎阿姨來了！達莎阿姨來了！」女孩們迎著著達莎伸長雙手，彼此推擠。每一個女孩都想第一個把手放進達莎的手中。〈...〉達莎和小孩們一起放聲大笑，連太陽也對著如門一般大小的窗戶微笑。<sup>107</sup>

柯隆泰期盼全體婦女都以達莎為目標，不要將親情限制於家庭之中，而要以真誠關懷的心，熱愛共產社會的每一位成員。婚姻與性愛觀或許為個人之事，但母性為整個社會應共同重視之事。<sup>108</sup>許多未登記夫妻皆期盼公共育兒所能擔起傳統家庭責任，繁衍後代與教育小孩不再是夫妻之間的事情，而是整個社會之事。皮利尼亞克(Борис Андреевич Пильняк, 1894-1938)曾在中篇小說《紅木》(Красное дерево, 1929)描述當時女性的不願結婚，期望國家幫助她們的想法。小說中的克拉芙季婭(Клавдия)為一名懷有身孕，卻不知道父親是誰的「新女性」。

「我關心的不是愛別人，而是我自己，我的體驗。我挑選不同類型的男人，體驗不同的感受。我並沒想要懷孕，我只想到性的愉快，沒有想到將有孩子。不過。我懷孕了，而且不準備打胎。」

「你不知道誰是你丈夫嗎？」

「我拿不準是誰。但這無關緊要。我-是-母-親。我能對付，國家也會給我幫助。至於道德.....我不懂什麼叫道德。我不想理會道德或不道德，或者說，我有我自己的道德觀。我只對自己負責，我維護我自己。〈...〉我不需要一個丈夫來盡我的婦道，丈夫只是在我需要而又不成為累贅的時候才是好的。夜裡我不一定需要他的陪伴，嬰兒出世時不需要他來幫忙。人們會幫助我。我信任人們。人們喜歡那些有傲氣而又不至於加累於他們的女人。國家肯定會幫助我。」<sup>109</sup>

<sup>107</sup> Gladkov, F.V. *Cement*. New York: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1974, p. 36-37.

<sup>108</sup> Stites, Richard. op. cit. p. 355.

<sup>109</sup> 皮立尼亞克。〈紅木〉//《不滅的月亮的故事》。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02，頁35。

這一段很清楚表達出「新女性」信賴國家，相信政府會幫助，甚至擔起養兒育女的責任。除了公共育兒所外，柯隆泰還提出公共住宅與廚房的概念。二〇年代，所有無產階級成員都必須工作。工作乃是身為共產社會成員最重要的責任與義務，連女性也不例外。然而，大部分的男性仍期待妻子洗手做羹湯。女性無法同時負荷工作與家務，便提出共同廚房的概念。婦女集體準備餐點不僅可減輕女性負擔，飲食問題也能圓滿獲得解決。柯隆泰認為廚藝並非女性的價值所在，「男子觀察女子不是看她怎樣會揉麵粉，而是尊敬她的人格、個性以及她是『人』。廚房和結婚分開，這和宗教與國家分開同樣重要。」<sup>110</sup>

二〇年代的女性期待政府擔起女性傳統的家庭功能，包括養育小孩及家務。傳統責任不能束縛「新女性」，新社會必須賦予女性絕對的自由與權利。家庭、愛情或小孩都不再是女性生活的重心，找尋自我人格與實現社會使命才是無產階級女性之人生目的。

### 參、性愛觀

新興的婚姻與家庭觀念改變兩性之間的相處模式，連帶改變了青少年的性愛態度。對一八六〇年代虛無主義女性來說，性與愛仍是無法分離的兩個概念。到了十九世紀九〇年代，傳統價值觀動搖，社會動盪不安，許多知識份子對未來抱持悲觀想法，造成悲觀主義盛行。他們認為事物的本質皆是醜陋、邪惡的，不論人們如何奮鬥都改變不了醜惡的本質。此概念造成兩種結果：一為自殺盛行，二為自我墮落，沈淪於性放縱，即為「薩寧主義」(Санинизм)。薩寧主義乃是以一九〇七年阿爾志跋綏夫(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Арцыбашев, 1878-1927)出版之《薩寧》(Санин, 1907)為名，主人翁薩寧(Санин)體現當時青少年性愛分離的思維模式。當時部分年輕男女欲藉由毫無節制的性行為麻痺自己，有些則是欲透過性放縱，反抗傳統虛偽道德觀。<sup>111</sup>內戰時期，由於性愛分離的概念能快速解決生理需求，又不需負擔感情責任，社會接受度提高。至二十世紀二〇年代這種性愛分離的概念，稱作「杯水主義」(теория стакана воды)，即將性行為

---

<sup>110</sup> 同註 105，頁 153。

<sup>111</sup> Stites, op. cit. p. 186.

視爲如同喝水般正常之生理需求的思維模式。<sup>112</sup>杯水主義者認爲不論男女都有權利追求性滿足。愛情與婚姻不再是性行爲的前提，即使沒有婚姻關係，沒有愛戀關係的男女也能滿足彼此的性需求。

李銀河曾表示「一個社會女性的權力與男性權力越接近，女性就享有越多的性自由；一個社會女性權力越小，她們的性行爲就越受到限制。因此，女性的性自由是象徵女性權力是的一個重要標誌」。<sup>113</sup>性爲男女之間權力角力的重要場域，擁有性主控權的一方便是掌權者。這種透過性決定權力關係的現象，稱爲「性政治」。如同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在《性政治》中所說：

雖然它（性交）本身是一種生物的和肉體的行爲，但它深深植根於人類事物的大環境中，是文化所認可的各種各樣的態度和價值的縮影。除了別的作用以外，它還可以作為個體或個人層面上的性政治的模式。<sup>114</sup>

爲了顛覆傳統男權社會的價值觀與道德觀，「新女性」以追求性革命(sex revolution)作爲兩性地位平等之象徵。女性藉由爭奪性方面的主動權，脫離傳統被動之形象與特質。凱特·米利特認爲「性革命的目標是建立一種寬容、允許性自由的單一標準，一種未被傳統的性聯姻帶來的粗俗且有剝削性質的經濟基礎腐壞的標準」。<sup>115</sup>隨便與淫亂的性行爲並非性革命的目標，「新女性」欲透過性革命，宣揚新的社會道德觀，她們期望未來社會中的男女皆有性自由的權利。這乃是二〇年代的蘇聯「新女性」追求性解放最主要的原因與目標。

除了性革命外，反對愛情爲「新女性」另一特點。十九世紀受到高度讚揚的「自由之愛」(свободная любовь)至二十世紀成爲「新女性」批判的對象。十九世紀男性知識份子將追求「自由之愛」，挑戰男權社會的女性視爲「新女性」，但從二十世紀「新女性」的眼中，爲了愛情犧牲一切的女性是爲了取悅情人而做出犧牲，這種女性根本不配稱爲「新女性」。真正的「新女性」必須爲了自己、

---

<sup>112</sup> Эндерлайн, Э. Эрос в русской утопии. // *Адам и Ева: Альмах гендерной истории*. №2. 2001, с. 46.

<sup>113</sup> 李銀河，《兩性關係》。台北：五南圖書出版，2004，頁 159。

<sup>114</sup> 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性政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頁 32。

<sup>115</sup> 同註 113，頁 87。

爲了工作而否定愛情或將其置於生命的次要地位。她們呼籲女性寧可爲了工作犧牲愛情，也不能爲了愛情犧牲一切。她們認爲愛情是資本主義社會遺留下來的惡瘤，共產社會中沒有愛情，只有生理需求。根據一九二〇年代的問卷調查，百分之四十八的受訪者認爲愛情不存在，其中包括「男女之間沒有愛，只有性需求」、「男女之間除了生理需求之外，不存在任何情感」等意見。<sup>116</sup>近半的受訪者都認爲傳統的婚姻與愛情將人們侷限在舊有的道德框架中。如潘塔列蒙·羅曼諾夫(Пантелеймон Сергеевич Романов, 1884-1938)在短篇小說〈櫻花不再盛開〉(Без черемухи, 1927)中所描述：

我們不相信愛，只有『性』，因為我們的階級愛輕視心裡學，我們只相信生理學。女孩子常常和男孩子出去一個星期、一個月、或者一個晚上。誰把愛情看得比生理學更重要，就會被譏笑、被認爲有毛病或心智衰弱。

117

柯隆泰的確認爲傳統性愛關係具有排他性，相愛的男女會與社會隔絕，封閉自我，沈浸於兩人世界。對共產社會而言，這種排他性與密閉式愛情乃是一種威脅。因此，她反對一夫一妻制的傳統性愛關係。由於以上觀點，早期學者多將柯隆泰視爲「杯水主義」的倡導者。實際上，柯隆泰雖不反對多配偶制度，卻仍然肯定愛情。

柯隆泰於一九二三年出版的《邁向展翅的愛欲》(Дорогу крылатому Эросу!, 1923)中將男女關係分成「展翅的愛欲」(крылатый эрос)與「無翅的愛欲」(бескрылый эрос)。她認爲薩寧主義與杯水主義提倡的性愛關係既粗俗，又沒有靈魂與情感，這種性愛分離的男女關係被稱爲「無翅的愛欲」。「無翅的愛欲」以剝削另一人的身體爲樂，與資本主義社會剝削女性的概念相同。浪費精力的性行爲不僅貶低一個人的靈魂，更違背男女平等概念。因此，共產社會成員應從「無翅的愛欲」邁向「展翅的愛欲」。柯隆泰認爲無產階級成員應建立一種伙伴關係與團結友愛的集體情感，這種專屬於無產階級份子間敏感且有如同志般平等的愛情稱爲「同志愛」(любовь-товарищество)，它不僅結合友誼、熱情、

---

<sup>116</sup> Stites, op. cit. p. 360.

<sup>117</sup> 照明編輯部譯，蘇俄諷刺文學選《列寧的頭不見了》，台北：照明出版，1979，頁 122。



母性溫柔、迷戀、關心、吸引，還加上細微的感覺與經驗，同志愛擴大愛情的範圍。柯隆泰認為情愛必須跳脫家庭與性的範圍內，性愛不是簡單的生理需求，不該建立在純肉體的吸引上，性愛必須建築在同志愛上。集體的同志愛讓每個人都能保留完整的自我個性，提高人們對集體的忠誠度，它不會讓人民與社會隔絕，而是讓大家一起投入社會工作的行列，一起爲了共產社會理想奮鬥，這種共產社會的集體情愛關係稱爲「展翅的愛欲」。<sup>118</sup> 科隆泰認為只要成員之間的情感關係屬於「展翅的愛欲」，不論他們是登記夫妻、實際婚姻、多重配偶或是同性戀，政府都應該予以保障與支持。

同年出版的短篇小說「三代人的愛情」(Любовь трёх поколений, 1923)描述比較了三代「新女性」性愛觀的變化。祖母瑪雅·斯潔潘諾夫娜(Мария Степановна)爲十九世紀末的肯定自由的愛情的第一代「新女性」，她認爲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深愛著兩個人，所以爲了忠於自己的感情，她違背父母與第一任丈夫私奔；之後她又爲了實現另一段愛情而離開丈夫，任何三角關係都違背她個人的道德原則。

我母親(瑪雅·斯潔潘諾夫娜)在愛情的問題中定下了自己的道德規範，誰不按照這種規範行事，她就會從內心毫不留情地譴責他，鄙視他。平時我母親是個好心人，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一個傑出的人，但一旦牽涉到性道德問題，她就非常刻板、嚴肅和無情。<sup>119</sup>

然而，她的道德原則卻使她與女兒奧麗加漸行漸遠。第二代「新女性」奧麗加·謝爾蓋芙娜(Ольга Сергеевна)認爲愛情不應侷限在兩個人之間。當她向母親表示自己同時愛上 M 與康斯坦丁，堅持不願與任何一人分開時，母女兩人首度發生爭執。

「如果妳對 M 只有肉體上的慾望，而對康斯坦丁是愛和尊敬，那麼妳就應該控制自己，和 M 分手……」

---

<sup>118</sup> Stites, op. cit. P. 353.

<sup>119</sup> 柯隆泰。〈三代人的愛情〉//《蘇聯愛情小說》。上海：知識出版社，1991，頁 33。

「問題就在這裡，母親，我對 M 不僅是肉體上的慾望，這也是愛情，不過是另一種愛情.....如果有人對我說，M 處於危險中，我願為他獻出生命，去營救他.....如果有人要我把愛賦予康斯坦丁，我做不到.....但我愛康斯坦丁，我需要他，我內心需要他，沒有他太冷漠，太空虛。不過你看，如果把 M 當作一個普通人看待，我不可能尊敬他和愛他。」

「簡直是無稽之談！」我母親生氣地說。<sup>120</sup>

母女因為愛情觀差異而爭吵延續至下一代。第三代「新女性」為杯水主義信奉者茱妮婭(Женя)，她同時與數個不愛的男人維持性關係，其中一位還是母親奧麗加的情人，奧麗加因此痛苦不堪。蓋妮婭認為

只要是我喜歡的男子，我就會委身於他們，但卻不打算愛上他們，你也知道，愛上一個人是需要時間的。我讀過許多小說，知道愛需要人們去付出多少時間與精力，可是我沒有時間。〈...〉還有，有時剛認識一個男子，對不起，他不久就被召到前線去了，或者調到另一個城市去工作，或者她本身有許多工作要做，因此就把他給忘了。.....正因如此，互有好感的人就十分珍惜兩人在一起的歡樂時光.....這樣做不需要人們去承擔任何義務。<sup>121</sup>

柯隆泰透過三代女性表現出不同階段的「新女性」感情觀與特質，但文中可看出柯隆泰對茱妮亞的性愛觀抱持懷疑態度。奧麗加曾向敘述者表示

我似乎感到整個悲劇為眼下在蘇聯改變的觀念和生活關係的所造成的直接後果，在改變的過程中，既會湧現偉大的、創造性的東西，也會產生許多醜惡的、陰暗的、庸俗的東西。在這場悲劇中，滑稽可笑只是表面現象，而不是問題本質。<sup>122</sup>

---

<sup>120</sup> 同上註，頁 44。

<sup>121</sup> 同註 118，頁 64。

<sup>122</sup> 同上註，頁 30。

還有，小說中不斷重複「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是無節制的放蕩嗎？是因為沒有道德法規限制嗎？是新生活引起的觀念的改變嗎？是從正在成長的階級本身的任務中產生的嗎？是新的道德標準嗎？」<sup>123</sup>等句子皆透露出柯隆泰並非完全贊同杯水主義的性愛觀，她對新道德觀的正當性有所質疑。

大部分男性都誤解柯隆泰，或者說他們根本不想瞭解女人的想法。政府官員批評柯隆泰愛情與政治不分，鄙視她混亂的性關係，曲解「展翅的愛欲」之意義，甚至主張科隆泰鼓勵社會女性效法茱妮婭等說法，這些都是造成後代學者誤解科隆泰之因。

### 第三節 「新女性」面臨的社會困境

「新女性」追求平等的作法或許有些偏激，但出發點都是為了實現真正的兩性平等。然而，一連串的社會問題使蘇聯女性的處境每況愈下，政府政策與社會態度迫使女性一肩扛下家庭與經濟雙重負擔，女性悲慘程度比起沙皇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一節將從婚姻與經濟兩方面，討論「新女性」所面臨的社會困境。

#### 壹、 婚姻不穩定

##### 一、 實際婚姻

實際婚姻由於自由、毫無拘束，且無須責任，吸引不少年輕男女的目光，他們認為這種關係體現烏托邦世界男女平等之精髓。然而，自由性關係造成的惡果卻得由女性承擔。男性能夠毫無責任地換過一個又一個女人，女性卻得承擔結果，即私生子之扶養問題。實際婚姻中的夫妻關係沒有約束性，家庭結構不穩定，社會動盪不安。大部分男性變心後都將小孩丟給女性，女性必須出外工作，扶養小孩。工作能力強的女性還能將小孩安置於育兒所，靠工作所得餬口。然而，大部分無法扶養小孩的女性只能棄養，社會孤兒數量甚至比沙皇時

---

<sup>123</sup> 同上註，頁 62。

期還多

爲了改善此種情形，一九二六年頒佈的婚姻改革法承認實際婚姻的合法性。政府要求實際婚姻的男性必須負擔贍養費及小孩教育費。然而，卻沒有任何政府單位強制男方執行，因此，此法令的實際功效令人懷疑。加上新經濟政策讓許多男性陷入經濟困境，男方或女方皆無力扶養小孩。二六年的婚姻改革法雖企圖透過承認實際婚姻，改善女性地位，但是二度簡化離婚卻使農村女性苦不堪言。

## 二、 離婚氾濫

除實際婚姻外，離婚氾濫同樣動搖傳統家庭結構，女性仍是最大的受害者。簡化離婚法原本是爲了拯救無法離開丈夫的可憐女性。然而，根據一九二〇年代的統計，百分之七十的離婚案件都是由男性單方提出，男女雙方同意的例子僅佔百分之七，大部分男性皆以妻子太落後的理由訴請離婚。離婚簡化非但幫不了女性，反而鼓勵男性拋棄年華老去的妻子，另娶年輕女性爲妻。離婚氾濫反而讓許多中年婦女陷入獨自扶養七八名小孩之困境。

這些女性紛紛站出來反對離婚法，她們要求必須將離婚困難化。其中一名女工表示「這個社會中大部分的女性仍比男性落後且缺少技能，女性自然不如男性獨立。當一位女性走入婚姻，生養小孩，埋首於廚房，之後卻被男人丟到一旁。這樣對女性太殘忍了」。<sup>124</sup>這些女性將柯隆泰與其他「新女性」視爲眼中釘，認爲她們動搖傳統家庭結構與社會穩定，成千上萬名女性必須因此孤獨且痛苦地度過下半輩子。

## 貳、 失業問題

自從十九世紀後半俄國急速工業化後，女性失業現象便一直是社會面臨的問題。內戰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男工被徵召上戰場，女工一度取代男工地

---

<sup>124</sup> Engel, Barbara Alpern. *Women in Russia 1700-2000*.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04, p. 163.

位，數量曾高達七十二萬人。然而，戰爭結束四百萬男兵歸國，男性不論技術或體力皆優於女性。加上新經濟政策失敗，陷入經濟困境的工廠無法額外負擔產假及育嬰假。因此，儘管女工薪資低廉，工廠還是偏好男工，上萬名女性面臨失業與解雇問題，女工比例從一九一八年的百分之四十五降到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二十八。<sup>125</sup>一九二五年後，政府由於資源不足，關閉育兒所，女性爲了照顧小孩，只能放棄工作；沒有工作而陷入經濟困境。柯隆泰的「兩姊妹」(Сестры, 1923)便是描述失業女性之困境。女主角由於女兒生病不得不辭去工作，女兒不治身亡與丈夫外遇促使她離開家裡，獨自謀生。然而，找不到任何工作的困境逼得她尋求敘述者之幫忙。丈夫的外遇對象也是因失業缺少金錢，只能當情婦求溫飽。小說結尾透露出女性的悲哀與無奈。

這個女人說完，她的雙眼質疑著生命。你可以看到她的表情充滿絕望，一位女性單獨面對失業問題所造成的恐慌。這是一位追求獨立，試著挑戰舊社會體制的女人。她走了，可是她絕望的表情困擾著我。這問題需要一個答案.....它需要行動.....它需要大家的奮鬥。<sup>126</sup>

不論是家庭結構不穩定或失業問題，女性與小孩都是最大的受害者。缺少丈夫與政府支援，獨自扶養小孩的失業女性根本無法討生活。女人只能靠肉體賺錢，娼妓數量增加說明女性悲慘命運，蘇維埃政府卻不想正視女性問題，也無力改變女性命運。

儘管政府曾努力改善婦女地位，立法落實兩性平等，二十世紀初的女性運動還是無疾而終。凱特·米勒指出當俄國人民面臨政治與經濟問題時，社會革命就很難徹底實行，況且馬克思社會主義並未提供一個有效的思想基礎，天真地以爲否定男權制歷史與規範便能掙脫其束縛。恩格斯則是僅分析男權家庭的歷史和經濟情況，忽視它灌輸在人們腦中的思維模式。<sup>127</sup>女性運動並非單指改變法令或女性權利，必須改變社會大眾的整體觀念。在經濟混亂的蘇聯社會中，女性不願放棄對家庭的依賴與安全感，男人不願意放棄他們的特權與佔有權。人人皆談論男女平等，卻很少人能付諸實行。

---

<sup>125</sup> Ibid. P. 153.

<sup>126</sup> Kollontai, Alexandra. Alix Holt trans. *Sisters*// Selected Writings of Alexandra Kollontai. New York: Norton, 1977, p. 224.

<sup>127</sup> 同註 113，頁 224。